

基于价值认同的红色档案资源的传播路径探究

潘迎 杨学功 潘彬彬

(南京市博物总馆,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要】红色档案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价值。实现价值认同是其传播的立足点, 所有传播策略和创意皆围绕于此展开。价值认同的实现, 须从传播受众出发, 探索红色档案资源的价值与现代外部环境的契合点。目前缺乏立足于此的传播策略与创意。次主流传播、借鉴季播模式增强与传播受众的情感黏性、顺应融合传播潮流激发受众主体地位、构建数字人文促进价值认同等传播策略融合了传播受众主体和现代外部环境的共同需求。

【关键词】红色档案; 传播; 传播创意; 受众主体

红色档案指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个机关、组织和个人在各种对敌斗争和政治轰动中所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音像及其他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1]红色档案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的重要见证, 蕴藏着丰富的精神指向。目前学界对于红色档案资源作为红色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聚焦于红色档案资源的价值判断, 在价值发挥途径和形式方面则以加强红色档案的保护与征集、构建红色教育架构、高校、基地联动机制^[2]、营造校园红色文化氛围等^[3]。目前关于红色档案资源的研究侧重于其价值方面的载体, 缺乏立足于价值认同开展的传播策略研究。本文拟从传播的视角, 基于传播学中的弱传播理论来探究红色档案资源在发挥其红色文化教育价值、实现价值认同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路径。

一、红色档案资源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红色档案资源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 向人们传达的信息主要指向革命思想、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 通过与生存环境以及探索对象的交互性传播, 实现红色革命思想的内化和价值认同。因此, 价值认同和思想内化则是红色档案资源传播的立足点, 立足于价值认同的传播创意和传播策略则应是红色档案资源的着力点。

(一) 以资源的覆盖与输出, 忽视了受众的主体性

整合红色档案资源, 构建全方位的红色教育架构、高校、基地联动机制、红色档案进校园展览、

建设红色档案的网络平台、营造校园文化红色氛围、利用新媒体平台策划“互联网+”主题教育等是目前红色档案资源发挥价值的主要路径。贯穿这些路径的思路仍是一以贯之地强调资源的覆盖与输出, 希冀以数量的增加和覆盖面的扩充达到教育价值的实现。

这种传播思维, 把红色档案资源仅仅作为物证, 作为单方面输出信息的媒介, 是自上而下、自古及今的信息传达和教化运作, 典型地反映了红色档案资源管理机构长期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作为意识形态权威机构的深层面相。这种传播路径与传播思维中, 受众的主体性是缺席的。

(二) 传播创意的匮乏

红色档案资源记录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光辉足迹, 蕴含着“一种高尚可贵的革命精神”, “具有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振奋精神的价值功能”^[4]。因此, 在实现红色档案资源的功能、价值过程中更需要技巧与精心的布置。

现有常规做法是先对红色档案资源的内容整理归类, 然后设计其内容的表现形式, 最后借用新旧媒体如报纸、书籍、电视媒体以及网络媒体进行推广。在内容归类上, 主要把红色档案资源分为人物、事件、红色文学等等。从显性的创意与传播上来看, 直接输出主要方式为举办档案专题展览、开设专题讲座、利用档案解读相关革命实践或者人物、拍摄有关纪录片、搭建或者参与学术交流等等。上述做法, 缺乏立足于价值认同进行的红色档案资源传播创意, 导致在传播过程中, 停留在红色档案资源的载体与表

现形式上,缺乏对红色档案资源所蕴含内核的深思。

(三)注重群体形象传播,缺乏可识别个体化形象

作为中国重要文化传统之一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常常围绕团队”“强调以集体中的角色规则为行为指导”^[5]。集体主义文化在舆论世界的表现就是喜欢传播群体形象的正能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体形象传播有着鼓舞士气、大气磅礴的特点,但是传播上存在着先天的舆论困境。“舆论群体化”是“反情感传播”的一个工具。人们的情感建构都是具象的,群体形象缺乏辨识度,因而难以使人感动。^[6]红色档案资源中蕴含的红色文化、革命精神在传播过程中大多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认同是情感的联系,如果没有情感的构建,是难以实现认同的。

二、红色档案资源传播路径

红色档案资源的传播,前提就要思考如何形成价值认同。这是检验传播效果的唯一标准。一切的传播创意、传播路径皆应该围绕此而展开。当前在建构价值认同时,应充分考虑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环境、受众群体以及数字化时代的特征。

(一)次主流传播

弱传播理论中“舆论的次理论”认为,“在舆论形态的谱系中,主流舆论是最不活跃的舆论,次主流舆论是最活跃的舆论”。主流舆论因为是常识、常理且已经取得社会共识、基础性认同已经完成,因此最不活跃。^[7]次主流舆论因为“最接近主流舆论的舆论形态”“它与精英群体和权力组织最为亲近,与社会大众的共识区域也广泛重叠,因此,它获得的支持及资源远超过其他的非主流舆论。同时,它又没有像主流舆论那样已经进入完成时,所以次主流就成为所有舆论形态谱系中最活跃的舆论。”作为最活跃的次主流舆论,其主要特征为小小的叛逆——“价值主流、表达叛逆”。^[8]

红色档案资源在传播过程中,沉重与深刻是被敬仰的灵魂之重量,应是目光关注所在。然而,“轻”则是另一种生命的形式与状态。这里所说的“轻”主要体现在革命人物除了革命大业之外,其他如情感、学业、心性等日常生活。主要特质为非功利性,是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是个人心性与心境的自然流淌。革命的“傲骨”是在“非功利性”的生活中缓缓流淌。革命党人的“轻”,正如其“重”一样,是对情谊

的真挚回馈,是对爱人的无限敬意,是对生活的郑重承诺。革命党人的“轻”,是洒脱与风度,是情真意实的再现。因此传播视角除了关注历史之“重”如勇于牺牲、艰苦奋斗、斗志昂扬等厚重的内容以外,也应呈现历史之“轻”的一面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边边角角”如革命党人在情感、学业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冲突与取舍、革命大业与日常生活不同状态下的心态与休闲模式、人际关系的应对与处理、个性锋芒与纪律建设之间的磨合等等。此外传播文本语言方面,在中规中矩的表达中,应更多凸显生活化、时代化,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传播文本的撰写时,应该凸显具体事件中具体人物的个体经历,将个体经历与普遍的经验即主流价值相融合,“经历要个体的不能是普遍的,经验要普遍的不能是个体的”^[9];传播的价值取向应变为选择,将主旋律变成选择题,而不是唯一的单项选择;档案的传播应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呈现新的打开方式、查询方式与呈现方式等。

(二)借鉴季播模式,增强与传播受众的情感黏性

所谓季播模式,主要特指电视剧的播放上采用的按一定周期性规律制作播出的模式。在内容模式上,“是一种主要人物基本固定,叙事风格和叙事模式基本不变,每集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单元用来独立欣赏,剧情能够无限接续下去的开放式系列”。^[10]季播模式张弛有度,制作者采用边拍边播的制作方式,在充分尊重观众意愿的前提下,根据观众反应调整剧情,使得剧情的走向十分灵活。季播模式较长的传播周期“更加容易创造稳定的受众,并形成品牌效应”^[11],在增加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体的情感黏性方面十分有效。情感的建构是实现价值认同的前提。

目前的红色档案传播模式大多为只播一场的传播方式,各类活动仪式如各种开幕式、研讨会、座谈会、纪念会、联欢会、各种旅游节、文化节等,这一传播模式“可能有舆论高潮,但未必有记忆,甚至第二天连名字都记不住。”这种模式“没有情感积累,没有千回百转,更没有魂牵梦绕,自然少了离别感伤,因此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体的情感黏性不足。”^[12]

季播模式不同于常见的准备阶段、实施阶段、高潮阶段、延续阶段等,它没有预热,每一集都是高潮。具体到红色档案资源传播形式和路径的选择,无论是档案展陈、还是营造红色文化氛围,抑或通过新媒体等,一定期限内固定模式、固定频次传播措施的实施

应该被提上日程。如在各类媒体上固定刊出相对独立但是主题相同的档案,在传播过程中应及时根据传播受众的反馈,调整传播主题的侧重方向和呈现形式,实现传播者和传播受众在共同探讨基础上的成长。

三、顺应融合传播潮流,激发受众主体地位

媒体融合工作在当前国家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媒体融合涉及技术、经济、主体、内容、规范等人类传播活动的诸多层面。但是“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的融合”。^[13]在媒体融合趋势下,红色档案资源的传播过程必须打破闭门造车的传统,吸引受众参与,由传受双方共同构建传播形式与路径。如建设红色档案的网络平台,应一改传统权威信息发布者的角色,站在受众的角度构建开放性、互动性的平台。在平台内,档案来源应多元化;引导传播受众既是档案的接收者,也是发布者和阐释者。受众参与的过程,便是价值潜移默化的过程,也是价值认同的构建过程。当然,在传播者与受众双方互动、共同构建价值认同的过程中,红色档案资源的管理者应加强规范和引领,发挥主导作用。

内容层面的融合趋势要求红色档案资源传播过程中既要在设计形式上采用多样化媒介,也要在传播过程中持开放态度,将与主题有关的不同来源的内容加以融合。在内容融合过程中,要做好专业筛选,要把握好“内容专业性把关”与“内容的多源头选择”两个方面。以建设红色档案的网络平台为例,既要立足于馆藏资源,尽可能提供覆盖面广泛的档案资源或者相关文本、超文本等,也要通过超链接将指向不同受众所需要的信息,形成一站式的资源信息中心,即“集中力量于自己最拿手的,剩下的则通过超链来实现”。^[14]

四、构建数字人文促进价值认同

数字人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借鉴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软件或规模化数据为人文研究提出问题、界定问题和回答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其“主要范畴是改变人文知识的发现、标注、比较、引用、取样、阐释与呈现,实现人文研究与教学的升级和创新发展。”^[15]

档案使用者通过交互查询或者共同搭建有关资源,构建起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情感是认同的前提,数字人文在红色档案资源实现价值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值得探究。数字人文成为“连接档案与情感的桥梁”。^[16]

目前,红色档案资源管理部分在数字人文方面的内容大多为将非数字的人文资料加工转化为数字内容,建设人文数据库。建立人文数据库是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传播价值的重要途径和前提条件,但是“基于规模文本和教学科研需要进行文本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能更显数字人文的意义”^[17]。通过开发使用人文数字工具、软件分析理解数据集,将档案使用者从繁重机械的资料查找、文本比对、文本标记等工作中解放出来,让其能够基于自身认识和关注对象,重构对相关人物或者事件的观点。此外,将数字技术切入红色档案传播,对红色档案的使用、传播、呈现提供新的方式。如使用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空间分析工具等等,来分析红色档案中的人物关系、革命足迹、影响力圈层、阅读范围。

参考文献:

- [1] 黄明嫚.红色档案资源立体化开发研究[J].兰台世界,2010(4):40-41.
- [2] 苏程.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J].山西档案,2019(6):96.
- [3] 宋平.红色档案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效结合探讨[J].档案管理,2015(4):92-93.
- [4] 黄明嫚.红色档案资源立体化开发研究[J].兰台世界,2010(4):41.
- [5] 杨建君,杨慧军,马婷.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对技术创新方式的影响——信任的调节[J].管理科学,2013(12):2.
- [6][7][8][9][12] 邹振东.弱传播[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8:71-72,126,130,152,256.
- [10][11] 张宏,王沁沁.季播剧的优势与问题分析[J].现代传播,2009(3):95,98.
- [13] 韦路.媒体融合的定义、层面与研究议题[J].新闻记者,2019(3):35-36.
- [14] 邓建国.媒体融合基础理论与前沿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260.
- [15][17] 朱本军,聂华.跨界与融合: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首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会议综述[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5):17,18.
- [16] 龙家庆,王玉珏,李子林.融合与建构:数字人文研究与档案工作的关联及路径探索[J].档案与建设,2018(12):5.